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 军事行动的经济考量

姚 昱

〔摘要〕20 世纪 50 年代，国民党军频繁袭扰、封锁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给当地的经济民生造成严重威胁。为此，1950 年至 1958 年人民解放军发动一系列夺岛战，两次大规模炮击金门、马祖，还开展各种常态化小型防空战、空战和护渔护航战，并谨慎、灵活地控制军事行动的时机、节奏和规模，保证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既有安全稳定的环境，又不必承受更多的军事开支。这些军事行动极大压缩了国民党军袭扰的范围，使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获得和平稳定的生产和海上运输环境，保证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台海危机；“关闭”政策；护渔；护航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3)-03-0078-14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during Military Operations along China's Southeast Coast in the 1950s

Yao Yu

Abstract: In the 1950s, the Kuomintang's forces frequently harassed and blockaded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region of the mainland, posing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local economy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s. For this reason,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launched a series of island seizure operations from 1950 to 1958, conducted large-scale artillery bombardments of Jinmen and Mazu on two occasions as well as various routine small-scale air defense, air combat, and fishery and navigation protection operations, cautiously and flexibly controlled the timing, pace, and scale of these military operations, ensuring a secure and st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national economy while avoiding additional military expenditures.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scope of the Kuomintang's military harassment, providing a peaceful and stable environment for production as well as marine transportation in most parts of the southeastern coast, and ensuring smooth progress in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20 世纪 50 年代是台湾问题发酵的关键时期，不仅国共双方在东南沿海不断发生陆海空战斗，中美之间更是接连出现两次被称为“台湾海峡危机”的严重军事对峙，对中美关系、东亚乃至世界局势影响深远。在美台相关史料开放较早且丰富的情况下，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问题的研究多聚焦美台在两次危机中的决策和行动^①，两次危机对美台关系、美国对华政策、美英关系的影响^②。

① 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 2000 年以前，其成果介绍参见戴超武的《美国历史学家与 50 年代台湾海峡危机（上、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4、5 期）。对于两次危机中的美台决策和互动，台湾学者张淑雅有系列研究，如《文攻武吓下的退缩：美国决定与中共进行大使级谈判的过程分析（1954—1955）》《主义为先锋、武力为后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6 年第 25 期、2010 年第 70 期）等。大陆学者对美国危机决策的研究，主要有冯琳的《美国“两个中国”的实践与主张及台湾当局的抗争（1954—1955）》（《社会科学研究》2017 年第 3 期）、陈波的《危局中的赌局：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使用核武器决策再考察》（《军事历史研究》2021 年第 3 期）等。

② 主要研究有戴超武的《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关系与亚洲的冷战》（《史学月刊》2002 年第 10 期）和《美国的政策、英美“特殊关系”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兼论联盟关系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作用和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赵学功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和《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美国核威慑的失败》（《历史研究》2014 年第 5 期）、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 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等。

有关中国决策和具体行动的研究较为有限，主要关注两次危机时中国的威胁认知^①、中国领导人炮击金门的决策^②、两次危机与国内政治动员的关系^③，以及中苏在两次危机中的互动^④等问题。

上述史料和研究的不均衡使美台视角成为主流。既有研究在论述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问题时，多根据美台史料所呈现的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切点分析论述中国大陆的决策和行动。这个视角固然揭示了各方决策的相互影响，但不足以展现中国大陆决策和行动的内在逻辑及特点，从而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倾向。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由于美台最为关切两次危机，并将自己刻画为被迫进行危机管理的防守方，已有成果多采用单个危机管理研究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大陆视为两次危机的进攻方，较少辨析其决策和行动的防御性内涵，未能从整体角度来理解两次危机之间以及前后相关行动的关联^⑤。在研究对象方面，由于美台最关注台湾本岛和金门、马祖的防御，所以相关成果在探究大陆决策和行动时，也呈现重台（湾）金（门）马（祖）、轻浙江沿海的倾向^⑥。在研究层次方面，已有研究更关注单次危机期间中国大陆与各方的博弈以及政治、外交、军事和事件性因素的影响，如 1954 年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1957 年美国暂停中美大使级会谈、1958 年中东革命、中苏关系变化等，较少探究实力较弱的中国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却坚持多年持续用兵，是否有更加基础且比较隐蔽的国内因素考量。在评价决策和行动的效果时，已有研究多讨论两次危机对中国外交和政治的影响，忽视这些军事行动与国内其他领域变化的关联。

已有个案研究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国民党军封锁大陆沿海的“关闭”政策严重干扰了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和远洋运输，但未能剖析这一时期台湾问题的发酵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有何联系^⑦。

-
- ① 参见 Fravel, M. T. (2008).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ravel, M. T. (2019). *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② 关于中国两次炮击金门行动的全面论述，参见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1、12 期。关于中国战略文化对中国领导人两次台海危机决策的影响，参见 Zhang, S. G. (1992).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③ 参见 Christensen, T. J. (1996).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05-213; Chen, J. (2001).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④ 参见沈志华：《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沈志华、唐启华主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 年，第 131—157 页。
 - ⑤ 目前仅牛军提出，人民解放军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的行动实质上是一个整体军事行动的两个组成部分，只是 1956 年至 1957 年出现暂时性的平静；1954 年人民解放军夺取浙江沿海群岛与 6 月苏联万吨远洋油轮被劫持事件有关，是防御性质的军事行动。但牛军未就此展开详细论述。参见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第 245—246 页。
 - ⑥ 国内权威著作在述及中国领导人为何决定在 1954 年至 1955 年、1958 年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时，侧重国际因素的影响。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徐焰对上述军事行动有系统的介绍，但聚焦金门、马祖的防御问题。参见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不过，也有学者强调，1954 年至 1955 年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除有击破美台可能结盟的考虑外，在军事上主要是掩护进攻一江山岛的佯动。参见何迪：《“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政策的形成》，《美国研究》1988 年第 3 期。
 - ⑦ 有关国民党军“关闭”政策的系统论述，参见林宏一：《关闭政策：国民党当局封锁大陆沿海的行动，1949—1960 年代》，沈志华、唐启华主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第 35—60 页。有关英国对国民党封锁的反弹，参见 Elleman, B. A. (2012). *High Seas Buffer: The Taiwan Patrol Force, 1950-1979*. Newport, Rhode Island: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chapter 4。有关国民党经济封锁政策对中国大陆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和远洋运输的影响，参见 Adamec, J. “‘Our friendship is longer than the river Yangtze and higher than the Tatra Mountains’: Sino-Czechoslovak Trade in the 1950s”, and Gnoinska, M. “Chipobrok-Continuity in Times of Change: Sino-Pol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69”, in Schaufelbuehl J. M. et al., eds. (2019).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Cold War: Exchanges Beyond the Bloc Logic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Leiden: Brill, pp. 175-211。关于 1954 年国民党军劫持苏联“图阿普斯”号油轮的国际影响，参

根据国内多种史料文献,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持续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保卫当地经济的防御措施;为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和东南沿海较为稳定的安全环境,中国领导人又谨慎地控制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步骤,较好地兼顾了各方因素,使1950年至1958年东南沿海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就此而言,美台视角和危机管理研究方法的偏重需要作适当的修正。

一、1950年至1953年国民党军的“关闭”政策与人民解放军的应对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国民党军队虽基本被逐出大陆,但依然对东南沿海构成极大的威胁。他们利用海空力量优势占据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大陆近海诸岛,并以浙江的上、下大陈岛和福建的金门、马祖为核心,建立诸多前出海空军基地。国民党军从这些基地出发,不断轰炸上海、福州、厦门、汕头等城市,破坏当地生产,制造恐怖气氛^①。早在同年6月18日,国民党军还启动了“关闭”政策,主要针对北起辽河口、南至珠江口的广阔海域空域,力图封锁沿海港口、袭劫大陆及与其来往之外国船只、阻断大陆海洋运输、干扰海洋渔业活动、造成渔民失业,削弱新政权的经济社会基础^②。在此影响下,到10月底,中国重要的海上交通运输线——津沪线几乎中断,50艘大陆货轮被国民党海军击沉或掳走,东南沿海地区许多工厂因原料进口和产品输出困难而停工,甚至倒闭^③。

此时中国领导人已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确立为新政权的主要任务之一。1949年7月31日,毛泽东提出要在三年内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他们尤为关心最富庶的江浙沪地区的经济萎缩和军事安全问题^④。负责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防务的华东军区,在积极加强海空力量防护东南沿海的同时,于1949年底至1950年初先后夺取了上海附近的宁海、象山和舟山群岛,并开展护渔护航行动,使当地的渔业生产和海洋运输有所恢复^⑤。华东军区还联合中南军区筹划发动进攻金门、台湾的大型战役,以期彻底消除威胁^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面临的威胁不减反增。美国以“中立化”台湾海峡为由军事干涉台湾问题,纵容甚至鼓励国民党军加大对东南沿海的袭扰和封锁^⑦。华东军区大批精锐部队10月入朝作战后,不仅攻台计划被搁置,沿海兵力也一度十分紧张。为此,1950年7月中旬和1951年1月,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指示华东军区,应独立担负起华东地区的海防和国防,尽力保护长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安全^⑧。简言之,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此时台湾问题已不得不降格为由华东军区单独处理的军事问题,华东军区作战重心不是以消灭国民党军主力为目的的大型进攻性战役,而是以护卫当地经济民生为主的小型防御性战役。随后,华东军区和中南军区在长江口和珠江口发动了一系列小型夺岛战和海战,于1952年底打破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珠江口的封锁。富庶

见马骏杰:《“图阿普斯”号油船事件始末》,《环球军事》2009年第2期;冯晖:《“图阿普斯号事件”的影响初探》,《文学教育》2018年第6期。中国大陆因国民党军袭劫联邦德国货轮而被迫中止与其贸易的个案研究,参见陈毅:《迈力克默号事件与冷战初期联邦德国对新中国的贸易政策(1949—1952)》,《德国研究》2022年第2期。

- ① 仅1950年,国民党空军就轰炸上海8次、南京5次、杭州2次,宁波、海门、嘉兴、金华、衢州也遭到袭击。参见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156页。
- ② 参见林宏一:《关闭政策:国民党当局封锁大陆沿海的行动,1949—1960年代》,沈志华、唐启华主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第35—60页。
- ③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458页。
- ④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9—62页。
- ⑤ 参见《普陀渔业志》,方志出版社,2015年,第33页;《台州水产志》,中华书局,1998年,第21—22页;张立修、毕定邦主编:《浙江当代渔业史》,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13页。
- ⑥ 1950年初粟裕组织攻台准备时,仅华东军区就动员50万部队,但相比台湾的40万国民党军并不占明显优势。为保证作战成功,中央根据粟裕建议又调拨中南军区4个军作为二线梯队。参见《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496—497页。
- ⑦ 参见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56—160页。
- ⑧ 朝鲜战争爆发后,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大批精锐部队入朝作战,华东军区原有4个兵团只剩下2个。参见《张震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406、418页。

的长三角和珠三角趋于安全，上海以北和汕头以南的各海洋航线，上海至宁波、定海至石浦、石浦至海门的近海航线也逐步恢复，当地经济迅速复苏。^①

不过，因国民党军的袭扰和封锁，上海和汕头之间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停滞。渔业生产方面，迫于国民党军对沿海渔场的袭扰，浙闽渔民出海生产时必须配备民兵进行武装护渔，但依然难以抵挡国民党军舰的进攻^②。海运方面，浙闽沿海客运基本停止，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沿海货运航线——南北航线（东南各港口经台湾海峡至华北、东北各港口）被迫中断，只能将沿海运输分为北洋航线（上海至华北、东北港口）、华东航线（浙闽沿海）、南洋航线（汕头以南）三段进行管理^③。在最危险的华东航线段，上海至福州的海运因大陈、马祖等岛屿国民党驻军的威胁，只能利用距海岸1里的所谓“里公路”航线。该航线礁石、浅滩、渔网多，航道窄，水急浪大，又有国民党军的不断攻击，只能使用配备成班护船战士的小型货船，在海军舰艇和陆岸炮火掩护下进行不定期的编队运输；各港口还严格限制进港船只数量，以免聚集被袭^④。福州至厦门的海运因无法利用金门以东宽广的传统深水航线，只能用小型船只趁潮涌通过大嶝水道和集美海堤隧洞。陆路交通不畅的汕头港在1949年11月至1957年3月31日间共遭国民党飞机311批、1096架次轰炸，只能利用小船进出物资。大陆曾尝试利用台湾岛以东的国际自由航道沟通南北，但因缺乏远洋运输和护航能力，不得不花巨资雇用外籍船只绕行206海里，但外轮因美国对华禁运而不愿运输许多重要的战略物资。^⑤

为解除浙闽沿海面临的威胁，1952年6月华东军区向中央军委提交了该军区原参谋长张震拟定的攻取东南沿海岛屿作战计划，建议从打通上海至福州间海上交通、节省使用华东军区有限兵力、锻炼海空部队实战三点考虑，华东军区将在当年台风季结束后先攻上、下大陈，再经一两年准备后进攻金门^⑥。值得注意的是，它本质上是一个军区级作战计划，这是理解该计划后来演变的关键。首先，该计划主要着眼于打通上海至福州段海上交通的有限目标，并未涉及需要投入巨大兵力才能解决的台湾岛问题，也未考虑相关外交和军事战略等宏观因素。其次，此时朝鲜战争尚未结束而华东军区兵力有限，所以该计划强调节省兵力，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由北向南，先大陈后马祖、金门逐次解决东南沿海诸岛问题。^⑦因未考虑宏观战略因素，该作战计划于7月24日被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否定。彭德怀指出，人民解放军进攻大陈可能引起美国军事介入，如此中国将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两个方向同时对抗美国。为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的出现，他建议在朝鲜战争未彻底结束前，人民解放军应在东南沿海继续采取战略守势，主要任务是消灭海匪、打击敌军窜扰、适时攻占若干小岛以保护渔民生产和航运。27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看法表示同意，决定应在朝鲜停战后进攻大陈。^⑧

① 参见《当代中国海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113—139页。

② 参见张立修、毕定邦主编：《浙江当代渔业史》，第13页；杨瑞堂编著：《福建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96年，第24页。1951年至1954年中国海军在台州海域共护送渔船3157艘，渔场生产由海军“三统三包”，即统一力量、统一步骤、统一行动，包干、包安、包责。参见《台州水产志》，第342页。

③ 参见《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1卷，人民交通出版社，2020年，第5—6页；《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5卷，人民交通出版社，2020年，第14页。

④ 参见《上海沿海运输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68页。

⑤ 参见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403—404页；《彭德清纪念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58页；《广东省志·水运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当代中国的水运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80页；《福建水运志》，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年，第260页；《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1卷，第7页；《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5卷，第23—28、88—90页；《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6卷，人民交通出版社，2020年，第11页。

⑥ 《张震回忆录》（上），第491页。

⑦ 中南军区海军（即后来的南海舰队）此时实力较弱，无法进行大型海上作战，东南沿海重大海上行动只能依靠实力较强的华东军区海军部队。参见耿仲琳编：《吴瑞林史料》（下），2008年印行，第1220页。

⑧ 参见《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0页；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

1953年初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为迫使中国在朝鲜和越南停战问题上让步，实施“放蒋出笼”政策，更加鼓励国民党军袭扰大陆、封锁海上，并向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①。国民党也有意制造双方矛盾，借机于2月和7月发动对湄洲岛和东山岛的大规模进攻，并大肆袭劫大陆及与其来往之外国轮船，甚至出现了国民党海军与为英轮护航的英国海军在长江口对峙、几乎爆发战斗的情况^②。中国大陆此时再难容忍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的威胁。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到1952年下半年中国领导人已将迅速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1952年7月初完成的“一五”计划草稿明确提出，要在“一五”计划期间开展充分利用上海等老工业基地和积极争取苏联、东欧经济援助两项重要工作^③。苏联、东欧各国此时也开始运送中国急需的先进设备和短缺物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洋运输需求大增^④。中国为加强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特别利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国的远洋货轮开展大规模物资运输^⑤。1953年初，为确保东南沿海经济生产有安全稳定的环境，华东军区尚不强大的空军主力南下，在海军和陆军的配合下连续进行52次战斗，到6月解除了国民党军对温州港的海空封锁，恢复温州—台州近海航线，并控制了温州港以北的南北航道^⑥，随后兵锋直指国民党军控制的东南沿海岛屿的核心部分——江山岛、上下大陈、马祖、金门。

1953年9月，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提出新的先攻金门计划，建议人民解放军直接攻占国民党军外岛军事体系的核心——金门岛，这样就可一战而瓦解国民党外岛全部军事力量。但是，金门守军力量较强，该计划需动员大批人力物力，预计相关军费高达4.7万亿元旧币^⑦，这无疑会给初步开展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极大的压力。而毛泽东多次强调，1953年的军费预算不能超过1952年的50万亿元旧币水平，且此后全国财政支出中的军政费用比重不得超过30%。1953年国防费用超支后，中央军委在这一年的9月初确定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将1954年国防开支缩减至50万亿元旧币，全军总人数两年内从480万减少到350万。^⑧有鉴于此，加上福建陆路交通不畅、华东军区海军主力无法越过大陈南下支援、人民解放军尚未掌握福建制空权等因素，1953年12月中央军委放弃先攻金门计划，重回张震提出的较为节省经费的作战计划，准备1954年秋或1955年春先攻上、下大陈，得手后大约在1955年秋进攻金门^⑨。

经1953年两次讨论东南沿海岛屿作战计划，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同年12月4日，毛泽东决定，要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肃清海匪——保障海运——寻机

① 关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放蒋出笼”政策，参见“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Nov. 6, 1953,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1952-1954, Vol. XIV, Part 1,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p. 307。1953年3月至5月美国向国民党空军提供喷气式教练机70多架，全年在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等地训练国民党空军3500人，到1953年下半年提供约100架F-84喷气式战斗机。参见《美国当局加紧扩充台湾蒋匪的空军力量》，《人民日报》1954年7月19日。

② 参见林志龙：《英国对中华民国关闭领海政策（1949—1954）的因应》，《成大历史学报》2019年第57号。截至1954年7月，国民党海空军在台湾附近公海海面攻击了英国、丹麦、挪威、意大利、葡萄牙、荷兰、巴拿马、希腊、联邦德国、波兰和苏联等国商船，劫持数十艘，其中40艘英国商船遭到攻击和劫持。1952年12月1日，英轮“罗西塔”号船长被打死。参见《制止美蒋匪帮拦劫各国商船的海盗行为》，《人民日报》1954年7月20日。

③ 参见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22—428页。

④ 参见《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1卷，第6—10、40—42页。

⑤ 参见 Schaufelbuehl J. M. et al., eds. (2019).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Cold War*. pp. 175-211.

⑥ 参见《当代中国海军》，第141—144页。

⑦ 相当于4.7亿元新币。下文未作特别说明，均为新币。

⑧ 《黄克诚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第242、243、247页。即使严控军费开支，据1953年决算，全国财政总收入222.9亿元，总支出220.1亿元，国防战备费支出75.4亿元。国防费用实际支出绝对额超出原定计划25.4亿元，占全国总支出的34.3%，超出原定计划4.3%。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417、420页。

⑨ 参见《张震回忆录》（上），第477—478、491—493页；《第一任国防部长》，第192—19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93—194页。

收复台湾的次序，渐进地解决相关问题^①。

二、1954年至1955年人民解放军的浙江沿海军事行动及其经济考量

1953年浙东沿海作战时，因没有海军航空兵掌握制空权，华东军区海军只能依靠小型巡逻艇作战，较为被动。朝鲜半岛完全停战后，华东军区获得大批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陆空精锐部队，海空协同作战能力大增^②。1954年是“一五”计划的第二年，大规模经济建设继续推进，东南沿海地区既要进一步稳定安全，又不能有过多的军费开支。这一年全国财政总收入为262.4亿元，总支出为246.3亿元，国防战备费实际支出为58.1亿元，比上年减少17.3亿元，在总支出中的占比降到23.6%^③。据此，华东军区按原定方针积极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保护东南沿海的经济生产。3月至7月启动的猫头洋护渔战，引发了1954年至1955年国共双方在浙东沿海的系列重大对抗行动^④。

猫头洋是东南沿海传统的大型渔场，位于台州湾、三门湾之外，西起三门湾海区的蛇蟠岛，东到大小渔山，南起小鹅冠，北至菜花岐，面积约250平方公里。1954年以前大陆渔船前往该渔场捕鱼时，常遭附近岛屿上国民党舰艇和飞机的攻击。是时，华东军区没有海军航空兵，缺乏空中掩护的海军舰艇难以出海护渔。1954年3月，华东军区以回国的志愿军空军精锐力量为基础组建了海军航空兵，4月在猫头洋渔场汛期配合海军舰艇，为5000余艘渔船、5万多渔民护渔作战。这次护渔战果显著，华东军区掌握了大陈岛以北浙东沿海地区的制空权，5月中旬又夺取东矾列岛，从而将一江山岛纳入陆炮射程和飞机轰炸范围之内。^⑤受此鼓舞，5月19日，毛泽东批准粟裕的建议，指示华东军区海军主力南下至定海、石浦地区，并要求加强海军航空兵和水兵师（即海军陆战队）力量，准备下一步行动^⑥。

国民党丧失浙东沿海海空优势后立刻求援于美国，美国随即提供102架F-86飞机，1954年5月底又派两艘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船进入大陈水域炫耀武力^⑦。同时台湾当局还加快与美国的结盟，以图阻吓大陆。早在1953年12月，台湾当局就希望与美国政府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以获得美国对国民党控制岛屿的军事保护。但在沟通中美国提出，台湾必须承诺未经美国允许不得采取针对大陆的重大军事行动，这令蒋介石十分不满，谈判随后暂停。但7月蒋介石向美国表示，只要美国同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湾愿意放弃任何可能为美国所反对的进攻共产党的军事行动。^⑧面对这些威胁，中国领导人以谨慎且坚决的立场应对。毛泽东一方面指示华东军区应谨慎避免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⑨，另一方面批准两个空军师进驻浙东路桥以扩大制空权，并批准华东军区先炸大陈、再攻一江山、后夺大陈的作战计划^⑩。

除军事谋划外，中国领导人还根据国际局势变化，适时提出通过和平外交、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在1954年7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中国的和平外交在日内瓦会议上得到各国称赞，美国政府十分孤立并出现内部矛盾，未来中美关系也可能出现缓和。中国应利用宣传手段破坏美台结盟，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促其内部发生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缓和的分化。^⑪

①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第192页。

② 参见《当代中国海军》，第144、148—149页。

③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17、420页。

④ 参见聂凤智等：《三军挥戈战东海》，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1—32页；《萧劲光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第336—337页。

⑤ 参见《张震回忆录》，第493页；《当代中国海军》，第144—149页。

⑥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第211页。

⑦ 参见《不能容忍美蒋匪帮的侵略罪行和海盗罪行》，《人民日报》1954年7月16日。

⑧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83—584页。

⑨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第212页。

⑩ 参见《粟裕年谱》，第538—539页；《彭德怀年谱》，第571页；《张震回忆录》（上），第494页。

⑪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5—257页。

但是，此时东南沿海的远洋航运遭到国民党军的极大威胁。“一五”计划开始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大批远洋货轮穿梭于欧亚之间，运输中国与欧洲兄弟国家之间的重要交换物资^①。这些货轮自然成为国民党军重点针对的目标。1953年10月和1954年4月，国民党海军劫持了两艘波兰的万吨货轮^②。1954年6月23日，国民党军舰又在巴士海峡公海区域劫持了前往上海的苏联万吨油船“图阿普斯”号，随后宣布没收该船，并称苏联船员不愿回国^③。7月13日，国民党公开宣称将继续袭劫他国来华航运船只，并试图再次劫持苏联远洋货轮^④。面对巨大的风险，苏联和东欧船只不愿装载工业物资前往中国北方港口。据美国情报机构此时的一份文件披露，欧洲前往中国北方港口的远洋货运以往每月大约3万吨的水平，当前已极大降低；1954年前7个月承担东欧对华出口海运总量30%的苏联船只已不再驶往中国北方，导致6月23日到7月中旬相关的延误费和改航费高达50万美元；英国保险公司对来华远洋货轮的保费也从货物价值的1%骤升至5%^⑤。因为海运受限，1954年中国未能完成对东欧国家的出口任务，不仅影响了兄弟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导致中国积欠债务^⑥。为保证来华船只的安全，苏联驻华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还要求彭德怀出动海军空军为苏联轮船护航^⑦。

为保护来华外轮，7月13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与总参谋部、海军、空军商量后决定：首先，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为来华外轮提供护航；其次，考虑到台海局势可能长期难以改善，应尽快改变中国国际航线，外国货轮尽量停靠更为安全的广州黄埔港，并在广州湾建设可停靠万吨货轮的湛江新港和黎（塘）湛（江）铁路，开辟新的华南国际运输通道；再次，发动舆论攻势，揭露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海盗行为^⑧。不过，此时华南唯一可停泊万吨远洋货轮的黄埔港及其配套的京广铁路因港口吞吐和铁路运输能力有限，经常出现外轮无法及时入港或入港后无法及时装卸货物的情况^⑨，湛江新港和黎湛铁路的建成尚需时日，加之舆论斗争效果有限，能立刻改善东南沿海海运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军事护航。

在气象环境复杂、有大量外国船只飞机经过的水域开展军事护航活动，极易出现误击^⑩。7月

① 参见《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1卷，第15—26页。

② 有关波兰货船被劫持情况，参见 Gnoinska, M. “Chipolbrot-Continuity in Times of Change: Sino-Pol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69”, p. 197.

③ 参见钱永昌：《轻舟已过万重山——前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往事回想》，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年，第27页；马骏杰：《“图阿普斯”号油船事件始末》，《环球军事》2009年第2期；冯晖：《“图阿普斯号事件”的影响初探》，《文学教育》2018年第6期。

④ 1954年6月27日至7月21日，国民党军出动舰艇14批25艘次，频繁袭击来华商船、渔船，并尝试再次劫持苏联等国的货轮。参见《叶飞回忆录》，第643—644页。另外，同年7月国民党军4次炮击大陆商轮和来华贸易的外国船只，16次袭击东南沿海海岸和沿岸岛屿；8月又多次袭扰沿海地区；7月1日至8月15日掳走大陆渔船16艘；英国商船“湖北”号、“英契基尔达”号、“英契斯雷”号、“英乔伐”号和“格罗斯文纳水手”号均在马祖、金门附近遭到袭击、拦截盘查或扣押。参见《人民日报》1954年7月16、19日，8月21、27日，9月11日。有关此时国民党军在上海搜索苏联、东欧和其他国家来华船只的行动，参见林宏一：《关闭政策：国民党当局封锁大陆沿海的行动，1949—1960年代》，沈志华、唐启华主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第35—60页。

⑤ CIA, “Disruption of Soviet Shipping in Far East Following Seizure of Tuapse”, July 13, 1954,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80R01443R000200360011-0.pdf>; CIA, “Disruption to Shipping in the China Trade: Major Problem to Peiping”, August 19, 1954,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61S00527A000200010070-8.pdf>.

⑥ 参见《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第1118页。

⑦ 参见《彭德怀年谱》，第573页。

⑧ 参见《彭德怀年谱》，第572页；《黄克诚年谱》，第253页。作为舆论斗争，1954年7月16日的《人民日报》第1版同时刊登《不能容忍美蒋匪帮的侵略罪行和海盗罪行》《继续制造远东紧张局势、推行侵略政策，美国加紧指使蒋介石匪帮劫夺各国商船》两篇文章，公开谴责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劫持和袭击台海地区船只的行为。

⑨ CIA, “Current Intelligence Review: Disruption to Shipping in the China Trade: Major Problem to Peiping”, August 19, 1954,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61S00527A000200010070-8.pdf>.

⑩ 1952年海南岛海岸炮兵曾因浓雾误击波兰来华商船，幸未造成损失。参见《第一任国防部长》，第195页。

23日,我空军飞机在南海为苏联油轮“和平”号护航时,误击由美国C-54运输机改装的英国客机,机上多名英方人员伤亡。中国立刻向英国赔偿并公开致歉,英国也不再纠缠^①。但美军以搜救英国飞机幸存者为由,派出2艘航空母舰、8艘驱逐舰进入海南岛附近水域,并于26日击落人民解放军两架执行护航任务的拉-11飞机^②。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还积极建立多个包围中国的军事联盟体系。7月8日,蒋介石向美方表示愿意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征得美国同意^③。21日,艾森豪威尔宣称,美国正在研究与国民党政权结盟,并准备在东南亚迅速建立起一个针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联盟^④。24日又有迹象显示,美国还在拉拢日本、韩国与台湾组建“东北亚防御联盟”^⑤。

为打击国民党军的海空袭劫活动并击破美国的对华军事包围,1954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加快东南沿海作战节奏,同时明确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并立刻进行军事准备。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迅速作出制定解放台湾军事计划、修建鹰(潭)厦(门)铁路和外(洋)福(州)铁路、浙闽沿海采取联合作战行动等重要决策。^⑥新华社发文指出,1949年10月到1954年6月人民解放军一直在东南沿海作战并大量歼敌^⑦,以宣示中国大陆从未放弃对台军事斗争。为争取苏联的全面支持,正在东欧和苏联访问的周恩来29日和苏联领导人会面并向苏方通告,中国将通过舆论和军事斗争两种方式,向国内外公开提出此前未及时提出的解放台湾任务,希望苏联能满足中国未来三年增加的海空军订货要求^⑧。

7月30日,彭德怀主持军事会议,讨论“对台湾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及军事行动计划”,形成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全局性战略计划草案——《为执行对台湾蒋匪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⑨。该文件将解放台湾确定为人民解放军长期斗争方针,并要求立刻在浙闽沿海采取针对性的联合军事行动,即“边打边建不再等待”,在谨慎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前提下“坚持自卫原则、决不示弱”。8月8日,毛泽东批准彭德怀提交的对台军事计划以及9月1日至5日同时轰炸大陈、炮击金门的浙闽联合作战计划,“以积极行动配合联合国开会”^⑩。中共中央批准浙闽联合作战计划和轰炸大陈、炮击金门的具体作战计划后,于27日正式组建由中央军委指挥、张爱萍担任司

① 参见石善涛:《一九五四年中英运输机事件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

② 参见《第一任国防部长》,第196页。

③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84页。

④ 《美国统治集团企图和蒋匪缔结军事条约 变台湾为美国长期侵略基地扩大侵略我国》《美国将领接连到台湾活动》,《人民日报》1954年7月24日。

⑤ 参见《彭德怀年谱》,第573—574页。

⑥ 参见《第一任国防部长》,第193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61页。

⑦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65页。

⑧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62—26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05页。

⑨ 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的张震回忆,他主持起草的是《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该计划在彭德怀主持的军事会议上根据与会者意见略有修改,由彭德怀修订后报送毛泽东。参见《张震回忆录》,第498—499页。总参谋部1954年7月22日向中央军委上报《为执行对台湾蒋匪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其中采纳了粟裕所提华东军区海军主力南下、空军两个师前移至浙江路桥机场的建议,这标志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斗争方针。31日中央军委军事会议批准该文件后,8月5日总参谋部完成《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草案)。参见《粟裕年谱》,第541页。虽然两份报告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但从标题看,第二份报告应该是在作战具体步骤和内容方面对第一份报告的补充。

⑩ 参见《彭德怀年谱》,第574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66—267页。张爱萍就大陈诸岛作战计划所提最终方案是,轰炸大陈列岛后,先攻占一江山岛作为整个战役的突破口,同时佯攻披山,得手后隔半月即攻大陈。参见张翔:《浅谈一江山岛战役》,《军事历史》1992年第2期。毛泽东所提“配合联合国开会”应是指1954年7月14日丘吉尔正式批准英国向联合国提出托管台湾的行动。参见Jain, J. P. (1963). “The Legal Status of Formosa: A Study of British, Chinese and Indian View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7 (1), p. 31.

令员的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开始筹备相关军事行动^①。

上述行动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关于东南沿海作战的思路有了重大变化。首先，毛泽东调整了相关战略目标，除保护东南沿海经济外，又增加了两个短期战略目标——公开提出解决台湾问题以便中国占据战略主动、通过多种手段击破美国军事结盟行动，这远远超越1952年作战计划仅着眼于打通上海至福州段海上交通的有限经济目标。其次，对应战略目标的变化，毛泽东调整了军事作战的侧重点与次序。此前的东南沿海作战计划根据难易程度由浙江沿海到福建沿海、再到台湾岛顺次进行，有明显的先后次序和规模区分。但1954年7月底中国领导人强调，人民解放军应在不同地点采取同步行动，设法同时完成保护东南沿海经济、击破美台结盟、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三大任务。

中国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要求通过外交、宣传和军事行动多管齐下的方式妥善解决，并做好长期准备。《为执行对台湾蒋匪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和中共中央1954年9月25日制定的《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都明确指出，虽然“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但“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②。在8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解放台湾的时间也不会很短”，“这里面有军事工作、外交工作、宣传工作、政治工作”，同时“收复台湾也是个经济工作，如修建铁路。现在福建的经济和对国外的通商，因为有蒋介石，是个很大的障碍”，“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很复杂的，它包括有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是个艰巨的工作”^③。

1954年7月底中国发起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攻势后^④，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多次宣称要派美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大陆沿海岛屿，并于8月19日派遣6艘美舰进入大陈海域，连续每日出动160多架次飞机在相关空域活动^⑤。中国领导人在积极准备军事行动的同时，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于8月至10月先后接待英国前首相艾德礼（Clement R. Attlee）率领的英国在野工党代表团和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毛泽东、周恩来在与他们会谈时反复强调，中国愿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平共处以致力于国民经济建设，但美国不仅干涉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还不断支持蒋介石骚扰大陆，对东南沿海交通和贸易造成极大的损害，所以中国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⑥。由于英国工党代表团和尼赫鲁分别于8月26日至9月2日和10月底访问上海、杭州等地，为防备国民党军袭击沪浙，原定9月初进行的浙闽联合军事行动计划改为9月3日炮击金门、11月1日轰炸大陈^⑦。

中国的外交努力和军事行动未能阻止美国的军事结盟。9月8日，美国拉拢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成立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⑧，12月2日又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⑨。为继续完成保护东南沿海经济、准

① 参见《彭德怀年谱》，第574—575页；《张震回忆录》（上），第494页；《叶飞回忆录》，第644页；聂凤智等：《三军挥戈战东海》，第4页；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77页；丛胜利、王明亮：《一江山岛战役中的航空兵作战》，《军事历史》2003年第1期。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412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第227—228页。

④ 参见《人民日报》7月23日、24日、31日，8月1日、8日、15日、20日的相关报道；《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406页。

⑤ 参见《人民日报》1954年8月8日、13日、20日、27日的相关报道。

⑥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408—410、421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70—273页；《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1页。

⑦ 参见《彭德怀年谱》，第576、579页。

⑧ 参见 Editorial Note, *FRUS*, 1952-1954, Vol. 12, Part 1, pp. 898-899; 《国际条约集（1953—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26—230页。

⑨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87—588页。

备解放台湾两大目标，9日，华东军区向中央军委提交进攻一江山岛的具体作战方案。虽然毛泽东一度考虑该行动“目前是否适宜”，但在前指司令员张爱萍的坚持和彭德怀、总参谋部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月18日胜利夺取一江山岛，进攻大陈指日可待。美国政府不愿为东南沿海岛屿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最终说服蒋介石于2月8日至12日从大陈等岛屿撤军，至此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的力量被彻底清空^①。

三、1955年至1958年人民解放军的福建沿海作战行动及其经济考量

人民解放军夺取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后，浙江沿海经济环境大为改善。海洋运输方面，上海至华北、东北各港口的北洋航线日益巩固和发展，长江口至福州段航线基本恢复，海门以北航运可白天航行，温州等港口经济活力恢复^②。海洋渔业方面，浙江近海最为重要的大陈、猫头洋、渔山等渔场得以全部开发，渔港迅速发展，上海、浙江的渔民可以安全出海捕鱼。此前，因战争和国民党军“关闭”政策影响，宁波的渔船数量从1949年的1607艘骤降至1951年的675艘，专业渔民仅有3399人，捕捞产量1764.7吨。随着人民解放军不断扩大控制范围，加上当地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扶持渔业发展，到1953年宁波市有渔船972艘，捕捞产量达5795.5吨。1955年人民解放军攻取渔山、一江山、大陈岛后，宁波渔业进一步活跃，当年出海渔船3346艘，捕捞产量骤升至32270吨。^③1955年上海渔船作业范围，也从原来局限于东海北部和黄海海域开始向南方扩展^④。浙江全省海洋渔业捕捞量在这一时期也有跳跃性增长，从1954年的22.1万吨跃升至1955年35万吨，并在此后继续保持上升势头^⑤。因国民党军封锁而不能在福建沿海捕鱼的渔民，也从1955年开始大规模前往安全的浙江渔场作业^⑥。东南沿海渔业快速恢复和发展，渔民失业问题得以解决。

但是，人民解放军海空力量尚无法覆盖的福建及粤北沿海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为报复一江山岛的失利，1955年1月19日、20日，国民党军多次轰炸粤北汕头港和福建福州港，仅在福州一地就造成当地居民死亡161人、伤180人，1万2千多间民房被烧毁，数万居民在春节时无家可归^⑦。另外，由于福建沿海海运依然阻塞，1955年至1956年中国最大的中外合作远洋运输公司——中国—波兰轮船股份公司的远洋轮船不得不停止从国外前往华中、华北各港^⑧。

此时中国亟须打通台湾海峡的海运通道。一方面，1955年至1957年华南地区的系列重要工程，如黎湛铁路、湛江远洋商港和军港、海南石碌铁矿和八所港等纷纷开建，大批来自华东、华北、东北的基建物资南下^⑨。另一方面，1955年初，人民解放军决定加强厦门、福州、汕头防空力量，兴建漳州、晋江、汕头军用机场，华东军区海军主力部队南下三都澳。相关国防建设工程和配套的鹰厦铁路项目所需大量基建物资也必须从北方输入。为保证海运安全，2月8日、24日粟裕连续召开军事工程会议和防空掩护会议，决定为利用更加便捷的海运，人民解放军应自粤、浙向闽打通海运

① 参见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88—203页。

② 参见《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5卷，第20、28页。

③ 参见张立修、毕定邦主编：《浙江当代渔业史》，第25、83、632页；周科勤、杨和福主编：《宁波水产志》，海洋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④ 参见顾惠庭等编：《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⑤ 1950年到1958年浙江全省海洋渔业捕捞量分别为：1950年8.6万吨，1951年10.7万吨，1952年16.5万吨，1953年24万吨，1954年22.1万吨，1955年35万吨，1956年37万吨，1957年37.6万吨，1958年42.3万吨。参见张立修、毕定邦主编：《浙江当代渔业史》，第87页。

⑥ 参见《福建渔业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197页；《漳州市渔业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第138、146页。

⑦ 参见《彭德怀年谱》，第587页。

⑧ 参见《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1卷，第19—21页。

⑨ 参见《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6卷，第26页。

通道，并为海运提供充分的空中掩护^①。

如粟裕所料，上述大型建设工程开工后，迅速繁忙起来的福建沿海运输成为国民党军攻击的重点对象。国民党空军从1955年4月开始连续出动飞机袭扰福建和粤北沿海的城镇、机场、港湾以及商船、渔船，其中特别针对浙闽、粤闽航线上尚缺乏护航的大陈—沙埕—马尾航段和汕头—漳州航段。于是，人民解放军调动大批部队进入相关区域展开海岸、海空掩护。经过激战，人民解放军将国民党军的活动范围围制在三都澳以南和汕头以北，保障了海上运输船队的安全，使闽粤两期空军基地国防工程到1956年4月全部如期竣工，其他大型基建项目也顺利进行^②。1956年，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航空兵进驻浙江、广东、江西等新建机场后，中国沿海防空仅剩福建沿海500公里地段的缺口^③。人民解放军海空权的增强保证了东南沿海经济生产和运输的进一步发展。1956年之后国民党军对福州、汕头两港的轰炸减少，断航的中波公司从国外直航中国华北的航线自1957年逐步恢复^④。

解除国民党军对福州至汕头沿海地区的威胁成为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行动目标。厦门等地仍经常遭到国民党军袭扰，沿海运输也受阻于福州与汕头段^⑤。例如，1956年1月、6月金门国民党军两次炮击厦门，并利用福建大部分地区无空军掩护而不断进行空中侦察和袭扰^⑥。福州港虽从1955年开始有3000吨级载重轮船入港，1956年至1959年又修复两座可停靠3000吨以上载重轮船的浮码头，但因常遭袭扰而往来船只少、货运量低^⑦。汕头港周围的海运也十分危险，负责福建以南华南航线的广州海运局不得不于1955年成立护航大队，为前往汕头的轮船武装护航，或指令轮船在近岸航行。海上形势紧张时，华南航线东线（汕头—广州段）规定行驶船舶只限两三艘，并有意识地推延或提前通过危险区域的时间，在汕头港装卸的船舶每次仅限1艘，且只能在高炮防御密集的防空区域锚地作业，石油等危险货物的运输也不得不停止^⑧。国民党军还继续骚扰来华外国货轮，1956年3月追袭一艘瑞典来华远洋商船后，5月中旬又企图在巴士海峡劫持两艘苏联远洋船只^⑨。

1955年初，人民解放军开始考虑夺取福建沿海岛屿。3月5日，粟裕建议中央军委加速福建沿海军事行动，计划先打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弱的马祖，再攻金门。彭德怀同意该建议后，总参谋部和空军于5月12日向中央军委建议，6月底福州、龙田军用机场竣工后，空军部队即刻入闽。19日，毛泽东同意这一建议。^⑩但6月28日以后，彭德怀所提进攻福建沿海岛屿作战计划和空军入闽计划均被毛泽东长期搁置^⑪。

现有研究多认为毛泽东的搁置与中国此时希望通过和平手段顺次解决金马与台湾问题的“两步走”方案有关^⑫。其实，毛泽东此举还有重要的经济考量。此时已进入关键期的“一五”计划必须顺利完成，发动进攻金门、马祖的大型战役势必影响中国周边稳定、增加军费开支，干扰“一五”

① 参见《粟裕年谱》，第560—565页。

② 参见《当代中国海军》，第251—258页；《福建省志·军事志》，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293—295页。

③ 钟兆云：《试析空军入闽的经过及其对时局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④ 参见《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1卷，第24页。

⑤ 参见《当代中国的水运事业》，第180—181、206页。

⑥ 参见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第134—135、137页。

⑦ 参见《当代中国的水运事业》，第206—207页。

⑧ 参见《广东省志·水运志》，第276页。

⑨ 参见 Chinese Nationalists harassment of Soviet shipping discussed, Department of Defense, 21 May 1956, U. 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CK2349178651。

⑩ 参见《粟裕年谱》，第566—567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77页。

⑪ 参见《彭德怀年谱》，第597、598、607、619、628—629页。

⑫ “两步走”方案是指利用各方条件，首先尝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金马问题，如不行则动用军事手段；解放台湾本岛则留待未来条件成熟时再行争取。参见沈志华：《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沈志华、唐启华主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第135—136页。

计划和后续“二五”计划的进行。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希望争取尽可能长的和平环境并与世界各国合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1956年4月25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强调，为保证经济建设，中国应在“二五”计划期间缩减国防开支，将国家预算支出中的军政费用比重从“一五”计划期间的30%左右减至20%，以便先保证经济建设，待经济发展后再反哺国防建设。他还特别提出，要抓住当前和平环境，积极发展沿海地区的工业。^①11月21日，毛泽东在审定中央军委呈报的《关于目前沿海军事斗争的几项规定》时，针对美国、国民党军和韩国的军事示威和挑衅，指示人民解放军“必须遵照中央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既定方针，严守自卫的立场，采取特别慎重的步骤，决不主动惹事，以免政治上陷于被动”^②。

1957年底，毛泽东对福建沿海岛屿作战行动的态度开始松动。12月18日，他在陈赓《有关国民党军飞机入侵及加强内地防空作战事》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彭德怀考虑1958年空军入闽问题^③。根据1958年1月31日中央军委第141次会议的决定，3月5日彭德怀第6次向毛泽东提出空军进驻闽粤问题，建议七八月开始行动，并在必要时轰炸金门、马祖。8日，毛泽东同意进行相关准备，但到时是否进入视具体情况而定。^④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既有1957年底美国中断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国民党空军利用福建段防空漏洞深入内地进行空中侦察造成不良后果等多种因素的影响^⑤，也与此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有关。1957年秋冬，从农业生产掀起高潮开始，中国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南北物资交流频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北煤南运、南铁北运、南粮北运等大宗物资南北运输的急速发展^⑥。此外，“大跃进”也使中国加大出口以换取更多国外先进设备、工业原料等物资。国内外运输量的高涨，要求运力大、耗时短、费用省的海洋运输能进一步发挥作用。1958年初，承担中国海洋运输主要业务的上海海运局和广州海运局大幅提高海运计划指标。上海海运局最初提出1958年完成1000万吨货运量，3月又增加200万吨，下半年还三次提高年度运输计划指标，最终确定的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计划指标比1957年分别增长48.48%和47.65%。1958年上海南粮北运共114万多吨，比上年增长47.16%；1958年下半年，上海海运局北煤南运运量比上半年增加400%，南铁北运运量增加45%。因运输需求大，1958年8月至12月上海海运局不得不月均租用外轮载重18万吨。^⑦广州海运局1957年货运量167.4万吨（含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1958年跃升至255.6万吨。其中，国外货运量1958年增至60万吨（1957年仅为18.9万吨）；1958年煤炭海运量比1957年增长1.11倍，金属矿石海运量翻了1.52倍。^⑧

福州至汕头段海域仍然通行困难。因国民党军利用金门、马祖骚扰福州、厦门、汕头、湄洲等港岛，船舶进出福州港时向北需经壶江、乌猪的狭窄水道，经连江、北茭，过东冲半岛后才能正常航行；向南需出梅花水道，经平潭、湄洲湾到泉州。福州运往厦门的物资，需先至泉州港改装内港小轮或木帆船，再经围头，穿过莲河和集美海堤到达厦门。船只接近马祖、金门时均需要夜航熄灯。厦门港南线海运必须先是在厦门与旧镇、下寨之间由小轮夜间运输，再转大船由下寨运至广州、汕头；北线船舶则只能从高崎、集美过大嶼狭窄水道，经安海、水头、东石等地中转。承担南铁北

①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第273—276、284—287、293—294、303—304、306—309页；《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28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第330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第370页。

④ 参见《粟裕年谱》，第566—567页；《彭德怀年谱》，第672、674—675页。

⑤ 参见《第一任国防部长》，第208—209页；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第271页。

⑥ 参见《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1卷，第15页。《广东省志·水运志》，第273、297—298页；燕明义等：《上海沿海运输志》，第166页。

⑦ 参见《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5卷，第86、123—124、128页。

⑧ 参见《广东省志·水运志》，第297—298、302页。

运业务的广州海运局因缺乏绕行台湾的远洋巨轮，不得不花费巨资雇用外轮北运海南铁矿石。^①1956年广州海运局租用外轮货运量及周转量分别为1.0599万吨和479.2万吨海里，1957年骤增至5.6737万吨和5527.8万吨海里，产生了巨额租船费用^②。针对这些问题，1957年7月31日，中央军委批准实施的《执行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提出，今后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目标依次是“打击蒋海军和空军，确保我华南国际海上运输之安全；有步骤地攻占沿海敌占岛屿；在我海、空军充分发展和准备后，争取在国际情况对我有利条件下解放台湾”^③。

1958年初，中国领导人仍然希望能聚焦经济建设。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将军队数量从300万减至200万，省出经费对人民解放军进行现代化建设。6月21日，他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经济建设是当务之急。但随着东南沿海交通不畅对经济建设的阻碍作用日益突出，加之1958年年中台湾当局积极扩军备战、意图大规模袭扰大陆，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在国民党军袭扰大陆时给予坚决回击。26日，福州军区预判国民党军短时间内极可能大规模袭击福建，提出消极防御（采取撤离等防范措施，同时加强高炮防空作战）和积极还击两种应对措施。毛泽东、彭德怀、粟裕均赞成积极还击。^④

7月14日，伊拉克发生政变，美英先后出兵黎巴嫩、约旦，中东事件爆发。台湾当局借机提出要“反攻大陆”，17日蒋介石下令国民党三军积极备战，并持续举行军演、出动战机侦察袭扰闽粤沿海地区^⑤。国际局势变化以及美蒋军事异动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8日晚，他召集军方人员开会，决定对金门、马祖采取军事行动。25日空军开始入闽，8月23日大规模炮击金门。^⑥

炮击金门后，中国向国内外解释该军事行动为惩罚性行动时特别强调其中的经济因素。正如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所言，毛泽东对金门、马祖两岛展开惩罚性炮击，主要目的之一是“警告国民党反动派，使它不敢再放肆地在沿海骚扰”^⑦。9月5日晚，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外交官介绍炮击金门的情况时指出，此举“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⑧。第二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上也强调，炮轰金门并不是立刻进攻台湾或金门、马祖，“而是要给国民党一个惩罚性的打击”，因为“金门岛把厦门变成一个死港，马祖岛就把我们福州的闽江海口塞住了。这个东西得整它一下”^⑨。

炮击开始后，中国领导人发现，美国极力劝说国民党军撤出金门、马祖，有可能出现“两个中国”的不利局面。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收复金马除有重大军事和政治价值外，更有经济收益，“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有很大好处”，但“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等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据似乎较为有利”^⑩。

1955年至1958年人民解放军的福建沿海军事行动未能实现打通华南航道、贯通大陆南北沿海航线的经济目标，但有效压制了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地区的袭扰，使当地的海运得以迅速发展。1958年5月29日，由于温州以北的航运不再有被袭扰的风险，经国务院批准，交通部决定上海海

① 参见《福建水运志》，第264—280页。1957年1月13日国民党军5艘军舰发射1000余发炮弹炮击湄洲岛，击沉渔船5艘，渔民死8人、伤17人。参见林金祥、吴国富主编：《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志》，海风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② 参见《广东省志·水运志》，第298页。

③ 《粟裕年谱》，第611页。

④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第376、387—388、391页。

⑤ 钟兆云：《试析空军入闽的经过及其对时局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⑥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52—858页。

⑦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⑧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66页。

⑨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第419页。

⑩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第436页。

运局撤销船舶专职护航武装，武装护航的压力和费用大大减少，海运进一步活跃^①。1958年至1960年福建省的海运货运量、货运周转量有明显增长，分别从1957年的102.31万吨、23233.41万吨公里，跃升至1958年的178.39万吨、46896.46万吨公里，1959年的240.27万吨、66534.77万吨公里，1960年的329万吨和80504万吨公里^②。即使是紧邻马祖、金门的福州港、厦门港，国内沿海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也分别从1957年的5.1万吨、3729.59万吨公里和6.31万吨、3496.26万吨公里，跃升至1958年的28.41万吨、21928.17万吨公里和16.19万吨、7541.60万吨公里，1959年的47.53万吨、39207.16万吨公里和20.74万吨、7859.02万吨公里，以及1960年的58.5万吨和46913.76万吨公里和20.37万吨、9059.59万吨公里^③。同样，1955年至1960年汕头港的吞吐量，从1955年的77.1万吨，增至1956年的97.8万吨、1957年的130.3万吨、1958年的187.8万吨、1959年的250.7万吨和1960年的241.8万吨^④。宁波港的吞吐量从1957年60.4721万吨，迅速升至1958年的88.5276万吨、1959年的137.4737万吨和1960年的162.9万吨^⑤。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探究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台海地区为何以及如何不断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充分重视经济因素。当时的中国不仅面临国家统一和美国干涉问题，更面临两大经济挑战：一是国民党军企图扼杀大陆东南沿海的经济活力，二是东南沿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急需安全环境以及不必承担更多的军事开支。为保护东南沿海的经济生产，人民解放军不仅发动了一江山岛、大陈岛战役和炮击金门、马祖等重大军事行动，还持续进行小型、常态化陆上防空、海上护渔护航等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为避免大规模战事和沉重的军费压力干扰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中共中央于1953年底放弃了先攻金门作战计划，在“一五”计划的后三年搁置空军入闽，并在1954年至1955年和1958年两次重大军事行动中谨慎地控制规模。从经济效果看，人民解放军的系列行动意义重大，最终将国民党军的活动范围从整个大陆沿海地区压缩至马祖—金门段狭小区域，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获得和平稳定的海陆生产和海上运输环境，保证了经济和交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

由此看来，现有成果对美台视角和危机管理研究方法的偏重稍显不足。至少从经济层面看，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是为解除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对大陆经济的持久封锁而不得不实施的防御性行动。这说明将美台视为防守方、将中国大陆视为进攻方的基本定位存在一定偏差。同样，危机管理研究方法固然突出了两次危机期间中国面临的各种短期挑战以及高政治领域的多边博弈，但忽略了经济恢复和发展等低政治领域的国内因素对中国军事、外交行动的重要影响。此外，从危机管理角度评价两次危机期间中国军事、外交措施的得失也会有失偏颇。因为中国领导人的决策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为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效益，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突破现有以美台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框架，从中国经济和其他角度重新梳理这一时期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决策和行动，并审视其内在逻辑、特点和影响，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台湾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 乔 君)

① 参见《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第5卷，第28页。

② 参见《福建水运志》，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第261—262、296页。

③ 参见《福建水运志》，第264—280页。

④ 参见《广东省志·水运志》，第145页。

⑤ 参见《宁波港史》，第423页。